

伊朗现代儿童文学与童年观的历史研究： 伊朗儿童文学史项目(HCLI)与 伊朗儿童文学史研究所(IRHCLI)

[伊朗]佐拉·甘尼

马皓月 译

赵霞 校译

不论在世界文学还是各民族文学中,儿童文学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文类逐渐浮现出来的过程。随着它慢慢获得经典(canon)的位置,其目的以及文体、语言风格也变得越来越明确。在这里,经典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儿童和青少年认为是“一流”(classics)的作家与文本的集合体。

显然,关于儿童自主地位的阐述与这一历史过程、童年概念的发展及其在集体想象中所获得的呈现联系在一起。上述呈现又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文化、地理位置等相适应的。

为了理解代表着特定社会特征的现代儿童文学,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其历史发展的阶段。

伊朗儿童文学史项目(HCLI)与 伊朗儿童文学史研究所(IRHCLI)

研究和历史重构这样关键的工作,在所有国家的集体和社会想象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伊朗,这一工作也随“伊朗儿童文学史”(HCLI)研究课题一起展开。

“伊朗儿童文学史”项目由伊朗儿童文学史研究基金会于1997年开设,旨在实现以下目标:第一,回顾从古代到伊斯兰时期、20世纪早期直至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第二,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考察相关的童年概念、教育思想和各个时期反映一般社会层面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的文学作品。该研

究项目的预计结果将分为 10 卷,其中 1 至 7 卷已于 2001 至 2005 年相继出版。^①

为了推进这一课题,伊朗儿童文学史研究所(IRHCLI)^②也于 2000 年建立。这是一个致力于研究伊朗儿童文学史的非政府组织,主要的办公处设在德黑兰,备有一个专业图书馆和一个出版部门,总计有 45 名成员,包括研究员、图书管理员和文献资料工作者。除了支持研究人员的工作外,研究所的目标还在于汇集历史文献和 1850 至 1989 年之间出版的儿童书籍,建立伊朗儿童文化和文学网上数据库(DCLI)^③与伊朗儿童文化与文学国家博物馆,并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参与创造性、主动性的阅读。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项目与研究机构在最近十年间展开的积极、重要的研究活动,我们才获得了一种更为坚实的关于童年概念和伊朗儿童文学的历史重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对于国内文化现象的新认知,而这种认知将有助于我们的年轻一代理解本土文化与身份,并培养起一种更具责任感的公民意识。

古代伊朗童年概念的出现

现代儿童文学始于 20 世纪早期童年观的转变以及对于儿童发展阶段的更为清晰的定义。考察伊朗现代儿童文学的兴起,我们有必要了解那个时期的童年概念是如何被定义的,儿童生活的面貌又如何。

童年概念与一个民族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因此,它在根本上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对于它的考察也须将当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纳入其中。

儿童作为有别于成人的个体这一观念始于儿童在寺庙接受教育的古代社会^④,那时候,有关特殊礼仪的文本与文学文本首先以口头形式出现,其后被书写下来。最近,在伊朗南部发现了大量 16 世纪初至 20 世纪末之间的黏土练习板,这些练习板在当时被用作教学,学生在其上书写练习。除了口传儿童文学外,从萨珊王朝开始,儿童就开始喜爱书面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叫《阿祖里克树》(Asurik Tree)(发生在一株枣椰树与一头山羊之间的故事),关于这个故事的一份巴列维手稿要追溯到大约两千年前。

在伊朗,尽管从拜火教到伊斯兰教的不同的宗教派别以及伊斯兰时期卓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于儿童及其特殊需求有不同的观点,但儿童一直被视为有待教育的无知个体。有趣的是,这种观点与中世纪基督教把儿童看做罪恶之实的观点完全相反。伊朗杰出的哲学家和医生阿维森纳(Avicenna)在他的《法则》(Canon)一书中为童年的特点下了定义,尤其关注不同时期儿童的发展和需求。与阿维森

纳同时代的柏拉图(Plato)在其《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曾提及,伊朗的儿童养育是十分先进的。

尽管对待儿童的态度是开明的,但在伊朗久远的历史中,儿童的状况始终受到外国入侵和灾难性历史事件的严重影响,其中来自占社会大多数的被剥削家庭的孩子所遭受的经济和社会压迫最为严重。

19 与 20 世纪之间的转折点: 童年之集体想象的变迁

宪法革命(*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840—1920)^⑤导致人们对于儿童在食物、卫生、教育方面的基本权利的态度有了相当大的改观。尽管如此,在 20 世纪二十年代,儿童死亡率非常高,约有 60%—70% 的 5 岁以下儿童因为饥饿和疾病而夭折。在 20 世纪二十年代间,一些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陆续回国参与到伊朗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他们开始通过建立卫生中心、孤儿院以及母亲和儿童中心来改善儿童的日常生活。这些受过西式训练的知识分子致力于促进儿童心理研究、儿童教育发展和儿童书籍出版的理念在国内传播。20 世纪二十年代初,仅有约 5% 的伊朗人口是识字的。这一时期,在宪法时代现代化运动中幸存下来的传统学校(*Maktabkhaneh*)被现代学校所取代。因此,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曾同在德国学习的卡赞姆扎德·伊拉沙赫尔(*Kazemzadeh Iranshahr*)和穆罕默德·巴戈·胡什雅尔(*Mohammad Bagher Hooshiar*)],共同领导了一场“儿童学习”运动。他们的努力带来了教育系统和童书出版方面^⑥的一些变化。

到了 20 世纪四十年代,伴随着儿童生活的逐渐改善以及对于儿童发展阶段的更为清晰的定义,人们认识到儿童是一个有着特殊需求的群体,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在乡村或者城市,这些需求都应得到满足。

在伊朗社会,梅罕吉丝·曼奴查兰(*Mehrangis Manoochehrian*)是坚持儿童受教育权利的支持者之一,她毕业于德黑兰大学法律系。至 1950 年,她已经出版了若干儿童权利方面的著作。尽管伊朗在社会和经济变革过程中通过提升医疗保健、提高识字率、加强反童工的律法等措施,改善了儿童的生活,但二战以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创立却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的设立对许多国家包括伊朗的儿童观和儿童需要观带来了重大的变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伊朗这样的不发达国家的活动不仅减少了儿童的苦难,而且改变了社会对儿童的态度。

20 世纪四十年代,儿童心理学已成为德黑兰大学教育学系学科教师培训的一

部分。从1935到1960年间,将近有250名学生撰写了儿童教育学、儿童精神发展和儿童心理学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有助于研究者认识并关注童年概念以及人们对于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态度的改变。

穆罕默德·巴戈·胡什雅尔是伊朗第一位儿童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领域的教授和学者,他在这些领域为学生们翻译并出版了一部分基础性的书籍。1952年,胡什雅尔和他的同事创办了《舍皮蒂·法达》(*Sepideh Farda*),这是伊朗第一份教育学期刊,其中刊载了大量教育学的理论文章。这些讨论也引发了儿童文学论文的发表。

20世纪六十年代,上述活动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机构的建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识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系统向偏远城市和乡村的扩展,所有这些对于改变童年概念并使儿童文学运动从一个孤立的现象到一个机构性的存在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注本土儿童文学的诞生： 新的方法和教育理念

1963年,一群儿童文学专家和教育工作者成立了伊朗儿童图书委员会(Children's Book Council of Iran)^⑦,其首要目标在于发展本土儿童文学。这是第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儿童文学机构^⑧。伊朗儿童图书会的创始人试图传播儿童观、儿童文学和不同年龄段儿童所需文学书籍的知识。通过与国家教育系统的通力合作,伊朗儿童图书会试图满足儿童的发展需要。

1965年,在法拉王后(Queen Farah)的支持下,儿童和青少年智力发展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⑨成立了。该所通过聘请、鼓励一大批作家、插画家、翻译家创作适合儿童的、高质量的书籍,并在伊朗各地的城市与乡村建立儿童图书馆,为伊朗儿童文学带来了重大的变化。

尽管伊朗儿童图书委员会与儿童和青少年智力发展研究所做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但是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的概念上还未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期间,许多教育家和儿童作家认为作为教育工具的儿童书籍应该为孩子们提供指引。

除了教育的角度以外,也有来自左派和宗教团体的关于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思考。这些团体都把儿童书籍看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油价突涨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与普遍审查制度使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转向了象征性儿童文

学,并倾向于把儿童读物作为反政府的政治工具。沙默·拜罕吉(Samad Behrangi)是伊朗 20 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著名作家之一。他是左派,倾向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观念看待儿童的代表人物,这个倾向没有认识到儿童的特殊发展需求或儿童的一般权利。左派认为既然儿童最终将被卷入社会冲突之中,那么他们就必须通过儿童书籍的阅读来获得社会意识。

另一方面,宗教团体认为儿童是无知的个体,他们需要通过宗教学习来获得教益。伊斯兰教育忽视了儿童的大多数特殊需求,只有符合伊斯兰教规的需求才能被允许。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伊朗,通过宗教团体和左派知识分子的努力,儿童文学被改造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

1979 年伊斯兰教革命以后,原教旨主义者开始改变所谓的西方文化结构。他们试图找到一种与革命价值观相适应的儿童文学的新解释,并且高度支持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出发的儿童文学创作。这一政策在两伊战争期间也持续着,因为当时政府需要年轻一代对战争的支持。伊斯兰政府不但试图通过政府主导的教科书限制教师和图书管理员,加强图书馆审查制度以控制教育系统,而且还控制了伊朗儿童图书委员会与儿童和青少年智力发展研究所,开除了研究所的许多图书馆员,撤除了经评估被认为不良的书籍。

面临新的挑战

在战争结束后的 20 世纪九十年代,政府机构中出现了一个更为现实化的群体,他们熟悉国际形势,对儿童文学的思考也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在此期间,这些年来被孤立的一部分独立作家有了更多的机会来积极创作儿童文学。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和妇女展开了新的运动来争取他们的权利,社会上成立了许多非政府组织来回应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其中一部分即与儿童权利和儿童文学相关。

一百五十年来,伊朗人一直在努力争取他们的现代社会价值的制度化。从文化生活尤其是儿童文学中去除意识形态斗争,对于大多数试图改善儿童生活、推动儿童文学(作为一种增强智力发展的文学媒介)的非政府组织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①M. H. 穆罕曼迪(M. H. Mohammadi)、Z. 甘尼(Z. Ghaeni)主编:《伊朗儿童文学史》(*The Hist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Iran*)1—7 卷,伊朗儿童文学史研究所、查斯塔出版社(Cheesta

Publishing Co.)2001—2005 年陆续出版。

②网址：<http://www.chlhistory.org/enews>。

③又称 IRANAK 数据库。参见研究所网站：<http://www.iranak.info/en/DataBase/>。

④关于古代史部分，即从前伊斯兰时期到 1906 年的宪法革命期间，参见 M. H. 穆罕曼迪、Z. 甘尼主编：《伊朗儿童文学史》第 1 卷《口头传统与古代史》(*Oral tradition and Ancient Times*)、第 2 卷《伊斯兰时期》(*Islamic Period*)，伊朗儿童文学史研究所、查斯塔出版社 2001 年版。

⑤关于宪法革命时期新教育方式的发展、早期教科书的制作和伊朗的教育教学工作，参见 M. H. 穆罕曼迪、Z. 甘尼主编：《伊朗儿童文学史》第 3—4 卷《宪法革命时期》(*Constitutional Era*)，伊朗儿童文学史研究所、查斯塔出版社 2002 年版。

⑥关于“现代”伊朗儿童文学的兴起，参见 M. H. 穆罕曼迪、Z. 甘尼主编：《伊朗儿童文学史》第 5—7 卷《现代时期》(*Modern Era*)，伊朗儿童文学史研究所、查斯塔出版社 2003—2005 年先后出版。

⑦参见目前的 CBCI 网站：<http://www.cbc.ir/en/>。

⑧关于首个伊朗儿童文学机构的诞生和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儿童书籍的扩展，可参见前面提及的《伊朗儿童文学史》第 8—10 卷(即将出版)。

⑨见 <http://www.kanoonparvareh.com/84/index.asp>。

作者简介：

佐拉·甘尼(Zohreh Ghaeni)，伊朗儿童文学史研究所所长，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

译者简介：

马皓月，女，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赵霞，女，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